

全球史译丛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美〕J.R. 麦克尼尔 著
韩 莉 韩晓雯 译

阳光下的新事物
20世纪世界环境史

013071504

X-091
05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美] J.R. 麦克尼尔 著
韩 莉 韩晓雯 译

阳光下的新事物
20世纪世界环境史



北航

C1680442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X-091
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下的新事物: 20 世纪世界环境史/(美)麦克尼尔著; 韩莉, 韩晓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全球史译丛)

ISBN 978-7-100-09457-3

I. ①阳… II. ①麦… ②韩… ③韩… III. ①人类活动影响—环境—研究 IV. ①X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41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全球史译丛

阳光下的新事物: 20 世纪世界环境史

〔美〕J. R. 麦克尼尔 著

韩 莉 韩晓雯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9457-3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2.25

定价: 50.00 元

《全球史译丛》编委会

顾问：齐世荣

杰瑞·H. 本特利(Jerry H. Bentley)

主编：刘新成

编委：施 诚 夏继果 梁占军 韩 莉

《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 (global history) 也称“新世界史” (new world history), 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 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 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 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 1963 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史诞生的标志。40 多年来, 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国, 2000 年全美已有 59% 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 五年后又提高了十个百分点;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 全国 26 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 14 所开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 2005 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 75% 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 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历史, 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 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育体系; 2005 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推向高潮, 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利, 2001 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 在 2002 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上, 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总和, 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 但同时他们也承认, 进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 虽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 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泛接受; 许多历史学家主张, 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与地区的历史都有密切关系, 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 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 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 40 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 19 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惟一可靠依据。这样的

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 600 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

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引起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

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查克拉巴迪（Dipi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迪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在21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

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年5月

中译本序

J. R. 麦克尼尔

在地球表面生活的所有民族中，鲜有人群能够比中国人从理解环境史中获得更多益处。我们将环境史定义为人类社会与其所依赖的生态体系之间关系的演进，它与各类专门史一样会引发理论兴趣，但是它还有着或是可能有着实践的兴趣与价值。

中国目前从环境角度而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这是因为它经济发展迅速、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它还有着选择的机会。那些在 50 年或 100 年前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已经身陷代价高昂的基础设施与僵化的思维习惯之中，这一切将会缓慢地变化。而中国与之相反，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方兴未艾。如何选择将是 21 世纪环境决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欧洲（包括苏联）、北美、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建立了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严重资源消耗及严重污染型的经济。它们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物质需要及使自己成为军事强国的需要。它们成功了，但是付出了令本国与世界其余各国都感受到的沉重的环境代价。本书回顾了这些代价并试图解释这些代价是如何付出的。

中国也和所有国家一样，希望满足自己人民的物质需要，也像一切大国一样渴望军事强大。中国有可能达成这些目标而使本国和别国都不必付出可怕的环境代价吗？1850 年后以煤为基础的英国、德国，最终还有苏联和美国的经济造成的大气污染，杀死了几百万人，并加剧了气候变化。所有这些国家变得严重依赖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体系，即使是在环境代价已经显而易见后仍不能改变。中国也是必须这样，还是可能找到更好的道路？

中国现在正在推进世界历史上最迅速、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

1920 年后的美国、1950 年后的欧洲与日本，汽车主宰了城市生活，城市规划者因此而建立了无数的高速公路、停车场、加油站以适应日益增多的汽车之需。汽车当然有其好处，但是汽车数量的激增，以及交通工具种类选择的剧减，经常在增加城市空气新污染的同时又降低了城市生活质量。中国也是必须这样，还是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中国有了解别国工业化、经济迅速增长及城市化的经验的巨大有利条件。而 100 年前，没有人知道将化石燃料作为能源体系中心会带来怎样的环境代价。100 年前也没有人能够想象全社会接受汽车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任何一个去过洛杉矶的人都一目了然。在 20 世纪 50 年代，没有人明白核废料积累造成的困难，也不知道使用氮肥对环境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有了这些知识，如果我们能重新开始，我们会有不同的做法。

在 21 世纪世界环境史的形成过程中，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能够找到一条道路，创建生态可持续发展城市而没有污染吗？能够找到一条道路使经济增长与全球健康相协调吗？

答案尚不确定。但是 20 或 30 年后，一切都会清楚。如果中国能够对解决环境问题有所贡献，而不是加重污染，需要新技术与政治技巧。但同样需要的还有知识，知道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知道两者关系如何演进。简而言之，中国人比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了解环境史。

保罗·肯尼迪

20 世纪开始之际，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人类的集体经济活动正在对环境产生着奇怪的影响。鲑鱼已不能在被化学物品污染的水中溯流而上；工业城市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化石燃料燃烧后产生的微粒——再被风带向更远的郊外；烟霾（smog）每年使数以千计的人因呼吸道问题而丧生；为了不断获得新的煤炭供应，风景区被挖得千疮百孔，曾经令人赏心悦目的乡村因大堆煤碴而变得丑陋不堪。

环境遭受浩劫的双重根源在 1900 年就被观察家所了解。其一是 400 万年来缓慢增长的人口在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飞速增长，而且没有减慢的迹象。其二是 1760 年工业革命以来同样飞速发展的人类经济活动使得原本生机勃勃的能量被毫无生气的替代物所取代。这一切让古巴人何塞·马蒂（Jose Martí）和英国人 H. G. 威尔斯（H. G. Wells）这类知识分子怀疑人类经济活动的巨浪能否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持续下去而不破坏自然。

如果这些作家能多活 100 年，目睹了 20 世纪更为巨大的变化，一定会惊讶不已：世界人口增加了 4 倍，全球经济翻了 14 番，能源使用总量增长了 16 倍，工业产出扩大了 40 倍。但是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翻了 13 番，水的使用总量增加了 9 倍。所有这一切并不都是坏消息——20 世纪生产能力的增长使亿万人类与其先辈的极端贫困相比，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变化的急剧程度与巨大规模也意味着：在环境方面，20 世纪的历史与此前的任何阶段相比都大相径庭。

全世界有理智的公民都面临着双重挑战：第一，要理解刚刚逝去的那个世纪所发生的环境变化（及其后果）的程度；第二，要认真思考在人类无意识的集体活动突破的极限到来之前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麦克尼尔教授对过去一个世纪的环境变化所做的富有真知灼见而又引人注目的简要考察

是对第一重挑战的全面回应。书名已一目了然：至少在环境方面《传道书》所言的“阳光之下没有新事物”有误。对此，麦克尼尔教授在其著作第一部分的七章里全面说明：在我们周围的所有领域中——岩石层、表土层、大气层、水圈，还有生物圈——人类对我们的星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比以前历史的总和还要多。一项统计证明了这一点：据麦克尼尔教授（粗略）的统计，人类在 20 世纪所耗费的能量是我们先辈到 1900 年为止所耗能量总量的 10 倍还要多。

然而麦克尼尔教授并非只是记录下环境的变化。他真正感到有兴趣的是他所说的“本星球的历史与人类历史”的交互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第二部分同样，也许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这一部分里，他得心应手地分析了人口增长、移民、技术变化、工业化、国际政治、思想等因素——以及它们对环境政策所产生的“反馈影响”（feedback loops）。

麦克尼尔既不是一个卢德派（Luddite）也不是一个“一切都不能变”的环境决定论者。但他确实提醒我们应该谨慎，并采取行动，免使全球社会走向生物极限，虽然全球社会正在稳步走向这个极限，而且比我们以为得要更接近这个极限。

《阳光下的新事物》是一本写作流利、极有意义的著作，阐述了振聋发聩的观点，值得引起公众与政治家们的广泛注意。

如果没有我所得到的帮助与支持，这本书到 21 世纪也不可能出版，更不可能如此内容丰富。我在乔治敦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对此书的手稿提出批评意见，多数情况下是通读过全书的，这在 1998 年夏季占用了他们的大量时间：托马索·阿斯塔里塔 (Tommaso Astarita)，卡罗尔·贝内迪克特 (Carol Benedict)，埃默特·柯伦 (Emmett Curran)，凯瑟琳·叶甫图霍夫 (Catherine Evtuhov)，艾利森·加内 (Alison Ganes)，戴维·戈德弗兰克 (David Goldfrank)，安杰伊·卡明斯基 (Andrzej Kaminski)，戴维·佩因特 (David Painter)，艾维尔·罗斯瓦尔德 (Aviel Roshwald)，杰克·鲁伊迪 (Jack Ruedy)，乔丹·桑德 (Jordan Sand)，吉姆·谢德尔 (Jim Shedel)，朱迪思·塔克 (Judith Tucker)，约翰·图蒂诺 (John Tutino)。他们共同的专业知识让我避免了许多麻烦。其他乔治敦大学的同事阅读了部分手稿，同样给了我帮助：化学系的贾尼斯·希克斯 (Janice Hicks)，生物系的玛莎·韦斯 (Martha Weiss)，外交学院的蒂姆·比奇 (Tim Beach)，默里·费什巴赫 (Murray Feshbach)，理查德·马修 (Richard Matthew)，还有政治系的斯蒂夫·金 (Steve King)。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在这样一所大学工作，同事们愉快地分担了我加在这团队肩上的担子。

我的几位 1998—1999 年在乔治敦大学的学生阅读了部分手稿——让人高兴地——找到修改的办法：丹·布伦特罗 (Dan Brendtro)，埃里克·克里斯滕森 (Eric Christenson)，朱丽·克里维 (Julie Creevy)，布雷特·爱德华兹 (Brett Edwards)，凯蒂·芬利 (Katie Finley)，贾斯廷·奥斯特 (Justin Oster)，吉尔·沃勒 (Jill Wohrle)。还有几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学生，他们在我所教过的最好的班级中的学习热情使我投入世界环境史的研究：肖恩·凯普泰因 (Sean Captain)，布拉德·克拉布

特里 (Brad Crabtree), 南希·戈卢别维斯基 (Nancy Golubiewski), 埃琳娜·加门迪亚 (Elena Garmendia), 特里·威拉德 (Terri Willard)。在岁月流逝中, 他们不断地询问本书的进展, 鞭策我不断努力。

我的朋友、亲属与同事——让人皆大欢喜的——阅读了所有的手稿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彼得·坎贝尔 (Peter Campbell), 比尔·克罗农 (Bill Cronon), 丽贝卡·戴维斯 (Rebekah Davis), 唐·休斯 (Don Hughes), 约翰·克梅利斯 (John Kelmelis), 格雷格·马乔 (Greg Maggio), 鲍伯·马克斯 (Bob Marks), 伊丽莎白·麦克尼尔 (Elizabeth McNeill), 肯特·雷德福 (Kent Redford)。我还要感谢埃里森·范·库尼特 (Alison Van Koughnett) 和乔治·维蒂斯 (George Vrtis) 为我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材料。

我能够连续两年全职写作本书, 要感谢几个研究机构的慷慨支持。富布赖特 (Fulbright) 项目使我能够在新西兰工作 6 个月, 在奥塔格大学历史系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我要感谢罗布·拉伯尔 (Rob Rabel) 和埃里克·奥尔森 (Erik Olsen) 为我在亚南极区滨海胜地安排了舒适的生活, 正是在那里, 我开始认真思考本书。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1996—1997 年为我提供了研究资助而且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 尤其是在午餐时间。在这一年里, 许多受到资助的研究人员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帮助, 其中帮助最大的是泰玛·卡普兰 (Temma Kaplan) 和沃尔夫·费希尔 (Wolf Fischer)。威尔逊中心同时还提供了研究助理, 使我的研究工作更加轻松: 克里斯琴·卡恩韦歇尔 (Christian Kannwischer), 彼得·科奇斯 (Peter Kocsis), 安杰利基·帕潘托尼乌 (Angeliki Papantoniou) 和渡植白本 (Toshuko Shironitta)。1997—1998 年古根海姆基金会 (Guggenheim Foundation) 为我提供了研究资助, 使我得以闭门写作并完成本书的第一稿。乔治敦大学也给了我两年研究写作假, 同时还在这两年里给予我研究资助。

我还多次有机会从那些耐心倾听我所阐述的本书的宗旨的人那里得到有益的教益与评论。他们来自新西兰奥塔格大学、梅西大学和坎特伯雷大

学；来自威斯康星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以及美国环境保护署未来组。

我开始本书的写作是应“诺顿全球世纪系列丛书”（Norton Global Century series）总编保罗·肯尼迪之约。我感谢他最初的信任及后来的耐心。我同样感谢诺顿的斯蒂夫·福曼（Steve Forman），是他的坚持使本书的篇幅增加了两倍，他的改进意见（或是询问：“就到此为止了吗？”）让我对自己的文章感到惭愧，他同时还不断地鼓励我。我感谢苏珊·米德尔顿（Susan Middleton）是因为她努力使我的论述统一而又文字优美。

xix

我得以完成本书要感谢朱丽·比林斯利（Julie Billingsley）长时间而又努力的工作。在过去的年月里，她在许多方面切实地支持了我。